血雨腥风育遗孤 和平岁月援宁夏（五）

——马骏烈士夫人杨秀蓉来宁前后

拜学英

与总理夫妇的情谊

1966年，周恩来总理在百忙之中接见来京串联的学生代表，马骏长孙马竞华作为南开大学的学生代表，先后4次受到周总理的接见。每次接见活动结束，周总理都把马竞华单独留下，关切的问候杨秀蓉身体和家里情况，并叮嘱马竞华继承马俊的革命意志，听党的话，努力学习。

一次，马为华、马为平、马为娜从各自学校串联到北京，马竞华得知后相约去见周总理。马竞华对周总理说："我几个弟妹也来京串联，行前奶奶嘱咐我们有机会代她看望您。"周总理听后让他们等候几天。他们等了几天不见消息，便坐上返程的火车到了青龙桥站。周总理秘书赵炜来电话说，总理在西花厅要接见他们。马竞华骑着三轮摩托车追到青龙桥站，马为华三人听见列车长喊他们赶快下车有急事时，行李都没来得及拿，就下了车。当他们坐着摩托车赶到中南海时，错过了与总理约定的时间。他们又等了三天，11月3日，赵炜来电话通知他们十点钟到中南海西花厅，邓颖超代表总理接见他们。上午十点，马竞华领着马为华、马为平、马为娜来到中南海西花厅，赵炜带他们走进客厅。邓颖超走上前来，他们高兴的向她老人家问好。邓颖超说："总理非常惦念你们，很想见你们。最近非常忙，一天睡两三个小时，一周都未回家，我代表总理见你们，并代问你们奶奶和全家好。"说罢关切地询问杨秀蓉的身体状况、家里的情况。

邓颖超深情地回忆起当年与马骏共同参加"五四"运动，进行革命斗争的情景，动情地说："孩子们，共和国的今天来之不易。当年你们奶奶为支持爷爷的革命活动付出了一切，把金银首饰都让爷爷闹革命用了，爷爷被捕后，她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独自扶养三个孩子，真不容易呀，奶奶是一个伟大的母亲，她为革命作出了贡献，非常不简单，你们一定要好好孝敬她……"

不知不觉两个多小时过去了，他们要走时，邓颖超亲自送到大门口，拉着他们的手边走边嘱咐他们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千万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先烈们。他们走出老远了，邓颖超还依依不舍地向他们挥手，看着他们离去。

他们从中南海西花厅出来，心情激动的步行到长安街北京电报大楼给奶奶和家人发电报。邮电局的工作人员听说他们受到了邓颖超的接见，羡慕地说，这么大的事情要用大红纸发喜报。杨秀蓉和家人收到电报后非常高兴，感谢周总理和邓颖超对他们全家的关心和照顾。

1987年3月，在全国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上，时任全国政协主席的邓颖超亲切接见了全国政协委员、时任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的马骏次子马德钟；1986年6月邓颖超为有关方面题写了"纪念马骏同志"的题词；1987年，在马骏牺牲60周年前夕，邓颖超在北京家里会见了马德钟和孙子马为公、孙女马丽颖；当年中共北京市朝阳区委、朝阳区政府受北京市委委托重修马骏墓时，邓颖超亲自审定了方案，并撰文纪念，高度评价了马骏的一生。早在1963年初，在马骏牺牲35周年之际，邓颖超在1963年第2期《民族画报》上深情地撰写了缅怀文章《回忆马骏烈士》一文，以"站在五四运动前列""在拘禁中的斗争""光荣的共产党员和英勇牺牲的烈士"三个小标题，回忆缅怀、高度评价了马骏："马骏同志是中国人民、回族人民的好儿子，他对共产主义坚定不屈的崇高品质，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虽然早已牺牲，但他的精神将随着伟大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和胜利而永生"。还在文中披露了马骏率天津学生赴京联合开展请愿示威活动，为不忍同学们受殴打，挺身而出，遭当局拘捕，经过斗争被释放改名马天安的过程："这次斗争后，马骏就以天安为别名，我们大家从此也叫他马天安"。

1976年1月8日，周总理去世，杨秀蓉得知后悲痛万分，她不顾81岁高龄，相约子女家属10多人从宁夏、哈尔滨赶赴北京。她在马德钟、马为公、马丽颖和保健医生陈淑兰的陪护下，专程赶往北京，吊唁周恩来总理。杨秀蓉一行到达北京后，不顾旅途的疲劳，直接赶到北京医院吊唁，做最后告别。1976年1月12日《人民日报》头版和各大报纸次日刊发了杨秀蓉与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吊唁周总理的大幅照片。

每到马骏烈士牺牲的日子，年事已高、不便出门的杨秀蓉总是在家里以力所能及的形式进行纪念；毛主席、周总理逝世纪念日时，她在家里挂起两位伟人的照片，连同马骏的遗像一同与家人悼念缅怀。1992年7月11日，邓颖超逝世后，杨秀蓉的子女们亲赴北京守灵悼念。

英烈家风传后人

杨秀蓉举家来宁夏后和在东北期间每月领取着国家30元的抚恤金。来宁夏后，自治区领导杨静仁听说她每月全部收入就是30元的抚恤金，亲自过问提议有关方面把抚恤金提高到了50元，还为她办了生活日用品特供证，每月能买到尽量供应的大米、面粉、食用油等，按有关规定享受上了公费医疗，得到了党和人民的关怀照顾。

杨秀蓉虽没进过学堂，但她一生反对封建礼教，追求真理，为人正直谦和，识大体、明事理、顾大局，常用马骏等革命烈士的事迹和周总理的品格教育子孙们坚定理想信念，不论什么时候都跟着共产党走，继承马骏未竟的事业，为人民事业和国家建设作贡献。即使在最艰难的三年困难时期，仍不为组织添麻烦，有困难自己克服，从不无故向组织伸手。子孙们都在各自的岗位上踏实工作，努力奉献，低调做人。长孙马竞华高中毕业后，杨秀蓉鼓励其报考南开大学，希望他在爷爷读书、战斗过的地方，感受和学习革命烈士的精神，继承先烈们的遗志。马竞华不负众望，1962年考入南开大学。杨秀蓉几十年如一日的教育子女们，子女们没有一个与她争执。全家不论身处何地从事什么工作，都在她的严管厚爱下遵纪守法，不贪图国家和别人的便宜，没有一个人下海经商赚钱，儿孙们都遵纪守法，尽职尽责的做着工作。

杨秀蓉的长子马德铸，1959年由哈尔滨支援宁夏，1987年9月2日去世，育五子三女：子马竞华、马为坚、马为哲、马为凡、马为欢，女马美华、马为玲、马为娜；杨秀蓉的次子马德钟1958年来宁夏，曾任自治区人事局副局长、同心县委副书记、县长，区党委组织部三处处长，自治区统战副部长，1978至1985年连任第三、第四届自治区政协秘书长，1986年4月增补为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协第四届委员会副主席，1988年5月再次当选为宁夏政协五届委员会副主席，曾为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1996年6月26日去世。育四子一女：子马为华、马为平、马为公、马为宁，女马丽颖；杨秀蓉的女儿马德芳高中毕业后在宁安商业系统工作，育一子五女。杨秀蓉在世时，马德芳每年都与丈夫来宁夏看望母亲。

杨秀蓉晚年患有高血压等病，与次子马德钟一家生活在一起。为了照顾她的生活起居，家人雇请了银川马姓保姆。一次吃饭时，杨秀蓉为给保姆让座，不小心摔倒在地，导致右腿骨骨折（大腿根部摔断）一直未能接好，从此再未下地走路，常卧床休息。家人为让她晒太阳透空气，用藤条做一圈椅，扶她坐在圈椅上，几个孙子抬着她在小院子里转圈散心，患病期间，家人轮流排班护理。一年后的1979年3月3日因心肺综合症，加之大腿骨折后未接上的伤痛而去世，享年84岁。杨秀蓉去世后，时任自治区政府主席马信来家里看望慰问，与家人商议后事。马信说："老太太安葬在何地由你们自定，有关部门全力配合协助。"因当时银川无正式回民公墓，便经由民政厅批准在贺兰山下小口子果园下划出一块空地安葬了杨秀蓉。

1988年，马骏烈士牺牲60周年，家人考虑再三，深感杨秀蓉33岁时丈夫牺牲，又离开家乡在宁夏生活多年，丈夫马骏安葬于北京。家人据此决定将杨秀蓉的遗体迁往北京与丈夫合葬。经次子马德钟与北京市有关部门协商沟通，得以同意。1987年冬季，在自治区政协的帮助下，迁葬杨秀蓉遗体。起坟时，已去世多年的杨秀蓉遗体基本完好，起出后，用白布包裹，装在专做的简易木箱里，放置于拆卸了坐位的面包车内，由孙女马为娜、孙子马为平、马为凡护送至北京，与日坛公园内的丈夫马骏合葬。有关方面考虑在马骏墓碑上刻写杨秀蓉名子不大方便合适，便在墓旁另作标志，标明杨秀蓉与马骏合葬在一起。至此，与丈夫相隔了半个多世纪，履行了五十多年诺言的杨秀蓉终于长眠、陪伴在了丈夫身旁。

（全文完）

作者简介 拜学英，中国作协会员，宁夏文史馆研究员，现供职于宁夏政协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

■ 拾遗 ■

收条和回信里的军民情

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内有这样两件文物。"今收到贵会慰劳革命将士捐款壹万元正。此致。江西民众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这是一张收条。"昨日收存贵会转来之慰劳捐款，已由本会黄道、罗石冰两常委分别送交十一军与二十军两政治[部]主任领收……"这是一封回信。

这两张泛黄的传统红色竖行"八行笺"，是当时江西民众为起义军将士捐款的见证。

南昌起义时，慰劳前敌革命将士委员会的负责人之一是朱大桢，他是当时国民党左派人士。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让朱大桢认清了国民党的本质。中国共产党领导发动南昌起义取得胜利，让朱大桢看到了民族的希望。

1927年8月3日，朱大桢将募集到的一万银元送到了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这时的江西省党部是以共产党员为核心的国共合作组织。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之一罗石冰接受了这笔捐款，并当即为朱大桢开具了收条。8月4日，罗石冰又给朱大桢写了一封回信，告知他这笔捐款的详细去向。 （据《人民日报》）

雍正力推"普通话"

1728年，清世宗雍正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汉民族共同语（旧称"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上谕颁布后，闽粤二省的各个郡县普遍建立了正音书院，教授官话，凡是走读书、考试、当官之路的读书人都要懂得官话。甚至一度规定，不会讲说官话的童生，不得考取秀才。

雍正帝的"推普"上谕不可谓没有远见，然而收效甚微。尽管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但却为后来的张之洞等提出"官音统一天下语言"的思想和举措奠定了基础。

1902年，张之洞、张百熙等为清廷制定《学务纲要》指出："兹拟官音统一天下语言，故自师范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于官话一门。其练习官话，各学堂皆以用《圣谕广训直解》一书为准。"1909年，清政府资政院开会，议员江谦正式提出把"官话"正名为"国语"。

（据《郑州日报》）

汉代的"五天工作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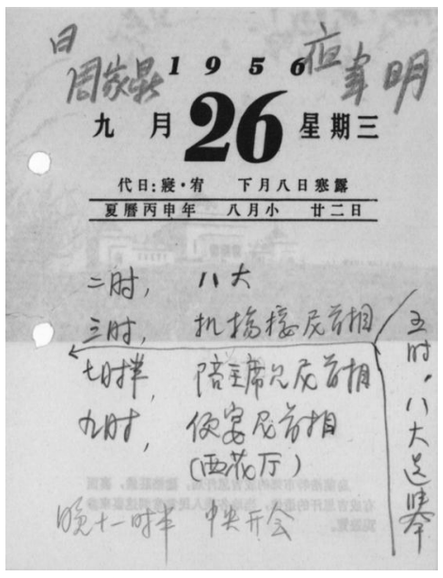
远在汉代，我国就实行了"五天工作制"，这个制度一直到隋朝才结束。

古代把休假叫做"休沐""洗沐""洗浴"等等。汉代官员一旦进入公堂，一连工作五天都不能擅自离开，吃住都在"单位"。有些在京城长安上班的外地官员，上班骑马到郊区，把马寄养在朋友家里，五天后休息时再骑马回家。

隋朝诗人江总在《山庭春日诗》中这样写道："洗沐惟五日，栖迟对一邱。"可见隋朝末年，"五天工作制"还在实行。 （据《广州日报》）

红色百宝 奋斗百年

弥足珍贵的工作台历



周恩来总理的台历。（资料图片）

在北京西郊的中央档案馆里，保存着近30本周恩来办公室工作台历。

这些珍贵的台历，时间跨度从1950年1月1日持续到1976年1月8日。轻轻翻阅台历，新中国前进的脚印跃然纸上，周恩来总理为党为国为民鞠躬尽瘁的精神令人动容。

1955年4月5日，距离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还有13天。此时的中国，尚未在联合国恢复合法席位。全世界193个国家中，与中国建交的仅有23个。

打破中国外交孤立无援的局面，参加亚非会议至关重要。中国要发出什么声音？提出何种主张和立场？这些问题让周恩来总理夙兴夜寐。

当天的工作台历上记录着这样的日程：上午十时，国务院常务会议；下午一时，外交部党组会；原定晚九时，看赴印缅文化代表团汇报演出并与周而复、郑振铎等一谈，由于政治局会议而取消。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周恩来率代表团参加了万隆会议，提出"求同存异"方针，阐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中国在万隆播下的友谊种子，结下了累累硕果。短短几年间，我国先后同尼泊尔等10个国家建立外交关系。

1964年10月16日，对新中国来说是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日子。这一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试验成功。

当天的工作台历，记录了周恩来一天的紧密工作安排，一直持续到晚上11时，涉及内政、外交多个方面。其中一行分外瞩目：17:00，中央接见"东方红"演员。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东方红》创作和演职人员时，周恩来总理向大家宣布了这个喜讯。

周总理要求大家暂时保密几个小时，电台没有广播之前，先不要随便传播。当晚11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新华社播发的关于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的《新闻公报》，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传播出去。

1972年5月18日，周恩来确诊罹患膀胱癌。在生命的最后岁月里，他也未停止工作。

工作台历记录得清晰而明确：从1974年1月1日至6月1日住进医院准备接受手术期间，每日工作12小时至14小时的有9天，工作14小时至18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小时的有38天，连续工作24小时的有5天……

1974年3月26日的工作台历记载：下午三时，起床；下午四时，与尼雷尔会谈（五楼）；晚七时，陪餐；晚十时，政治局会议；晨二时半，约民航局同志开会；晨七时，办公；中午十二时，去东郊迎接西哈努克亲王和王后；下午二时，休息。

一天连续工作长达23个小时，这对普通人来说不可想象，而周恩来总理当时已经76岁，而且身患重病、正住院治疗……

（新华社北京电）

我国古代的"中央巡视组"是如何工作的

在如火如荼的反腐行动中，中央巡视组无疑是最引人注目的亮点之一。我国历史上，与中央巡视制度颇为相似的制度安排，被称为监察制度。

巡视监察制度古已有之

"我国古代的监察制度由来已久，实际上，有官就有察官，有官就有考课。监察、考课是逐渐连在一起的，但作为一种监察制度，是从战国时期才开始确立。"中国法制史学界的泰斗级学者、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张晋藩张晋藩介绍。

秦汉时期的监察制度，重点在地方。秦废封建以后，实行郡县制，在郡设监御史。汉初一度废除，后来恢复。汉代汉武帝设立13部，各派刺史。13部就是监察区，由派出去的刺史作为监察区的监察官。监察郡的长官以及地方豪强势力，防止勾结。而且制定了6条法律，作为刺史进行监察的根据，通常叫"刺察六条"。汉代监察已经逐渐形成制度，中央有御史台作为监察机关，御史台的长官叫做御史大夫。在京城附近，还设立了监察京城附近七个郡的监察官，称为司隶校尉。

唐朝已是典章制度比较完备的时代了，监察制度和机构已经定型，有"一台（御史台）三院"制度。三院最重要的是察院。唐朝将天下分为十道，设十道监察区，由皇帝派监察御史出去，考察地方。

元朝虽不太崇尚法制，但很重视监察。元监察汉官，也有监察蒙族贵族的习惯，不仅提高了监察官的品级，而且在地方设立了两个行御史台，中央派遣，权势很大。肃政廉访司在元朝势力很大，一定程度上还被赋予了法律外的权力。

明朝的时候，是巡按御史发达时期。明朝很重视监察机关，改革叫都察院。御史巡按地方，不管定不定期，至少要半年。"回道"后，要详细奏报。清朝大体上延续明朝制度。清朝的监察官的法典、依据的法律，是《钦定台规》，已达到了法典的高度。

"御史出巡，地动山摇"

古代的巡视制度起到了什么作用？

据记载，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的主要任务在于，一方面维持国家纲纪，就是专制制度的政治体制；其次是官僚机构之间的一个权力制衡的机制，能保持权力的平衡；再者，能够纠正官邪，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素质，弹劾贪官污吏。御史出巡，巡按地方，确实对地方腐败起到了作用。以明朝为例，明朝后期政治腐败，皇帝连续几十年不上朝的情况下，官僚队伍还能维持，国家纲纪还能保持，地方上不敢为非作歹，其中监察制度起了很大作用。元世祖忽必烈称，"中书朕左手，枢密朕右手，御史台是朕医两手的，此其重台之旨。"这就强调了御史台，也就是监察制度的重要地位。

监察官是如何巡视地方的？我国古代对监察区域的划分各不相同。监察官员开头并不多，唐朝就8个人，到明朝也才30多个人。有的在朝廷里纠正朝廷礼仪，有的接收基层案件，有的负责弹劾，各有分工。御史出巡，有时候定期，有时候不定期。在明朝，一般先由都察院拟定候选人两人，由皇帝亲自当面选派其中一人。一旦确定，家门口将贴"回避"二字，以显重视。所以有"御史出巡，地动山摇"一说。

出巡御史的监察范围非常广泛。一看是否有冤案，二是考察政绩，三是考察经济情况如何。再有就是，祭祀的地方是否洁净，器械是否完备。监察官员也会深入到民众中间去，考察贤良。其中，司法权是出巡御史最重要的权力，即对法律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审查案卷。比如，宋朝在地方设立监司，监察府县。监司有四组监察官，分门别类为司法监察、财务监察、行政监察等，对不同对象进行监察。

御史的第一要求是品格清正廉洁

古代监察官的选任条件非常严格，第一要品格清正廉洁。明朝谏官杨继盛就因为弹劾严嵩父子，被反诬入狱，临刑前写了一首诗叫《言志诗》："饮酒读书四十年，乌纱头上是青天。男儿欲上凌烟阁，第一功名不爱钱。"这就表现了监察御史的品格。我国历史上还有很多像杨继绳、海瑞这样正直刚毅、敢于谏言的御史官员。

第二要有很高的文化素质，必须科举出身。

第三要有地方实政经验，明朝就规定，御史一定要有两任地方县令的经验。

另外，监察官的级别一般不高，有的甚至不如县官。虽职位不高，但位卑权重。在地方上，"小事立断，大事奏裁"。位卑，便于皇帝控制；权重，在于是天子的耳目。

巡视的御史权势很大，如何保障出巡的御史不敢为非作歹？这个问题古代是怎么解决的？一方面是监司互监法，宋朝提出监司互监法，监察官之间可以互相监督。另一方面，监察御史以上，有都察院的长官，御史巡视回来，要将巡视情况向都察院长官奏报，还要向皇帝奏报，长官起到监督的作用。再者，也允许地方监督。为了防止御史滥用权力，御史还有回避制度，监察时，要对出生地、籍贯地、亲戚故旧等回避。

出巡后，地方不得接待，财政由中央严格控制，对离京到任和离任返京的日期也做了规定，结束巡视后，要进行考核、奏报。御史如有犯罪，将加等治罪，从重论处。因此，监察官一般不敢贪污。

古代监察制度有哪些可借鉴之处

我国古代的御史监察制度是土生土长的制度，很有特色。晚清官制改革时，唯独都察院被保留下来。说明它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地方，在今天也值得借鉴。

首先，监察巡视要有法，法规要规定得很细致，如活动的程序、纠弹的对象、如何处理等。其次，重视对司法的监察。如死刑案件，御史台长官都要参加。对行政监察，则要监察效率。

古代御史出巡的时候，还要根据考察的地方和事件，按轻重划分大、中、小三个等级。大的事件由资深御史办理，年轻的御史只能办小差，经考核后，才能派遣大差。这也是为了保证巡按御史清正廉洁。然而，古代的监察制度根本的缺陷在于，监察权的来源是皇帝，所谓"代天巡狩"。因而，监察效力的发挥，很大程度上要看皇帝是否支持。

（据《中国青年报》）